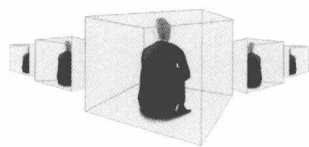


灵子 著

# 忧郁的常识

APC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教育出版社



忧郁的常识  
灵子 著



01984921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忧郁的常识 / 灵子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13.9

ISBN 978-7-5336-7709-1

I. ①忧… II. ①灵… III. ①作家—访问记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2089号

书名:忧郁的常识

作者:灵子

YOUYU DE CHANGSHI

出版人:郑可

策划编辑:何客

责任编辑:何换生

责任印制:何惠菊

美术编辑:吴亢宗

封扉设计:刘运来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,邮编: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(0551)63683010,63683011,63683015

排版: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

电话:(0551)64456946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787×1092

1/16

印张:16

字数:255千字

版次:2013年9月第1版

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7709-1

定价:36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# 序 言

作为一种文体的访谈

徐晓

认识灵子，正是因为此书中的一篇访谈。

三年前，看到许多网站都转载的热帖，周有光长达上万字的访谈《大同是理想，小康才是现实》。对于年过百岁的老人，特别像周先生这样的大家，在现实中国，真是摊开双手都数得过来的稀缺，这样的受访者，真到了采访一次少一次的光景。因此，我注意到了这个采访人。

三年前的灵子，是一家周刊的文化记者。那时除了职务要求的选题之外，业余时间她就与几个年轻学者做一个叫《独立阅读》的电子读书刊物。他们业余读书写作，意在交流读书心得，激励自己，也影响他人。灵子是其中的小字辈，这个“八〇后”的本科女生，却也成为了撰稿人和轮职编辑。

灵子的不简单在于，她居然采访到了这么多人物——从百岁老人周有光，到九十岁的历史学者何兆武；从台湾《巨流河》的作者齐邦媛，到香港《盛世

2013》的作者陈冠中；从大陆最具实力的小说家莫言，到台湾的才女朱天心……灵子还独占了一个“最后”——她最后一个采访了历史学者高华。2011年春天，当我得知她早有采访高华的心愿时，便与本书的受访者之一、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帮她实现了这个计划。她在南京分两次采访病中的高华，在稿子发表两个月之后，便传来高华辞世的消息。

对于受访者的选择，透露出灵子的态度：不管是史学家还是哲学家，不管是学者还是作家，她所选的受访者，总是既有历史视角下的人文关怀，又有现实视角下的社会关照。

做访谈并不是一件容易干的活儿。对一些作家来说，文事访谈之所以吸引他们，原因不止在于其间可以公示一些作品中未涉及到的信息，更在于谈话的对手善于以想象力激发行云流水般的对话。访者的贡献正在于，善于将作者与作品放在文化、心理、社会政治的水流之中，而不是使访谈变成一幕不受约束的单口独白。这就需要访者自身有足够的鉴赏力和领悟力，并且能够把握受访者性格及心理特点。

一篇好的访谈要有谈话的力度。作家访谈时往往划出一道界线，不让自己的生活或写作事业上的隐私受到触犯，这便是访谈最大的风险所在。如果访者的功夫不到，便可能内容空泛。但如果访者懂得问题要具有一种公共性、公开性，不让受谈者感觉到受了冒犯，让对方信任你、尊重你，觉得值得与你谈，便可以诞生一篇好的访谈。否则，一如苏格拉底之会见门诺，话不设机，难以收场。

在这本访谈录中，灵子与许章润讨论民国，与周有光讨论“两头真”，与高华讨论“革命话语”，与徐友渔讨论“文革”，与马勇讨论晚清……面对如雷贯耳、学富五车的受访者，灵子的话题非常广泛，问题也提得非常尖锐。我是想说，这不仅需要勇气，也需要实力。可以想象，灵子得做多少功课！没有足够的视野与大量的阅读，没有每一次采访之前的精心准备，要完成这些重量级人物的访谈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访谈之为一种文体—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采访，并不是当事双方片刻

倾谈之际“有闻必录”的纪实。将唇舌之间细碎的言外意、弦外音梳理成文，才算功德圆满。访者取舍的功夫，决定一篇访谈的质量与力量；访者的思路与文脉，亦决定一篇访谈是否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由此可见，做好访谈，并不完全取绝于是否有可以见到名人大师的人脉，更在于访者对受访者的整体把握，以及对于社会、文化的整体认知。正因为访谈有如此多的讲究与门道，我更认为，如此年轻的灵子，几年下来，能做出如此阵容的访谈，并成就了这本书，足够让我钦佩。

由此，更让人感叹，年轻人要想成熟起来，哪怕只是为了积累足够资本与人脉，都应该踏实下来，像灵子这样下苦功夫。更何况，在阅读浩繁资料的过程中，在与受访者面对面的谈话中，将得到多少平时与常人求之不得的营养与阅历？依然年轻、依然单纯的灵子，正是在这一过中成长起来，内向中添了些许稳重，拘谨脱变为从容。

因为一篇访谈，两年以前，灵子成为我在财新传媒的同事，《新世纪》周刊文化版的搭档。本书中灰娃、高华、熊景明、徐友渔、潘鸣啸的访谈便发表于财新《中国改革》月刊上。

在此，我向我忘年的朋友平生第一本书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。

2013年1月27日

## 目 录

### 序言

#### 作为一种文体的访谈(徐晓) 1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  | 周有光：大同是理想，小康才是现实     |
| 13  | 何兆武：不敢乐观，也不敢悲观       |
| 23  | 齐邦媛：我用诗的真理写他们        |
| 33  | 灰 娃：领教毒箭的分量          |
| 45  | 马 勇：一个王朝的隐退          |
| 56  | 许章润：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        |
| 71  | 高 华：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       |
| 90  | 杨奎松：直面中国革命           |
| 100 | 熊景明：我与服务中心二十年        |
| 117 | 许纪霖：我们这一代“真诚的虚伪”     |
| 127 | 徐友渔：作为知识分子，我充满了自我怀疑  |
| 147 | 余世存：知识分子要对这个社会的犬儒负责任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60 | 潘鸣啸：知青一代的独特风格           |
| 169 | 莫言：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应忏悔         |
| 178 | 阎连科：我站在两个完全分裂的世界之间      |
| 189 | 刘亮程：我们改变不了人心现状，能改变的只是生活 |
| 198 | 韩松：科幻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世界    |
| 210 | 陈冠中：“盛世”不是预言，我写的是今天     |
| 223 | 朱天心：纯文学的恐龙在这里           |
| 237 | 唐诺：只有文学无法躲闪             |
| 后记  | 247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周有光：大同是理想，小康才是现实

今年北京的3月仍属寒冬，在穆旦描述为“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”，不到六点钟，窗外便又冷又昏黄。前一天下起今冬第十场雪，平日喧闹的城市少得有安宁。胡同里三只小猫在四合院门口游逛，六只绿色眼睛射出逼人的光芒。

周有光住在这片老城区近三十年了，四间房加起来不到五十平方米，他从不介意，称“心宽室自大，室小心乃宽”。

九平方米大的书房里有一张黄漆小书桌，九十厘米长、五十厘米宽，漆掉了许多。左边摆着书稿，右边搬开电子打字机，便能挪出一片写字的位置。一百零五岁的周有光坐在书桌前，笑咪咪讲起话来，开心的时候他会以手掩口，仿佛大笑失了礼仪。

他喜欢用的形容词是“了不起”。“许多人以为我们有敦煌很了不起，这个现在看起来如此荒野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文化呢？历史上，敦煌是从巴米扬开始一直延伸过来的犍陀罗文化带（注：印度佛教文化和古代希腊文化的混合），绝大部分都被伊斯兰教毁掉了，只剩下东面头上敦煌这一段，而且不是这个文化带里水平最高的。”

他随手在面前的稿纸上写出犍陀罗的英文 Gandhara，由于不能确定拼写是否准确，很抱歉地笑笑：“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原来知道的东西我都写不出来了。”

从宗教谈到文化，从文化谈到历史、政治、经济，三个小时过去，老人仍不觉疲倦。晚饭时保姆进来打断他，要他下次再讲，他问我：“你今天在这里吃

饭吗？”我婉谢，他说：“那我还要再讲一会儿。”

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江苏常州青果巷。这条巷子很有意思，还住过瞿秋白、赵元任，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。在常州中学读书时，他钦佩一位叫吕叔湘的学长会背《诗经》，两人那时结识，想不到后来都从事语言研究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。同学要他拍一张西装照片寄去，他因为一直在常州，“土得很”，结果到照相馆戴了一个领带，又系上一个领结，成了日后同学必提的笑料。

周有光的专业是经济学，曾去日本留学，之后回国在大学任教，并曾任职当时“四小银行”之一的新华银行，派驻纽约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从美国回来。

“人家说我是‘左倾幼稚病’，但我们那代人经历过日本的侵略，都特别爱国。我搞经济学，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，没想到回来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，因为历史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。”

他认为二十世纪两件事对中国改变最大：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；第二个是共产党，改变了整个中国。

抗战时期他与家人从上海迁到重庆，天天“跑警报”。一次下班路上遇到空袭，炸弹带起的气浪将他甩到沟里，清醒之后他安然无恙，但周围的人全死了。经历过打仗的苦难，他反而生出一种乐观精神来，建国之后接踵而至的“反右”、大饥荒、下牛棚、抄家……在他看来都“无所谓，小事情”。

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。1955年10月，年近五十的他接受上级委派，改行参与中国文字改革。1957年就“反右”了，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中心，经济学教授都是“反右”重点。他的好朋友、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，他很好的博士生也自杀，他都不知道。朋友说如果他不是到了北京，到了文字改革委员会，肯定要做二十年监牢。“我算是逃过了一劫，不然二十年下来，即便不死出来也没什么用了嘛。”

周有光在语言文学领域建树颇丰，参与制定了《汉语拼音方案》，被称为

“汉语拼音之父”；创办现代汉字学，提倡研究比较文字学，填补了当时许多空白。他说这也不过是幸运而已，“当时等于很多荒地没人开垦，只要去就容易有收获。”

由于圣约翰大学以外交闻名，周有光一生中多次被邀请到外交界去做事，夫人张允和断然反对。“她是对的，假如我参加政治，就麻烦了。”

张允和出身安徽名门望族，家中四姐妹都相貌出众，品学兼佳。叶圣陶曾感伤地说：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，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。”后来老三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，张允和则嫁给周有光。周有光伉俪一辈子恩爱有加，这么多年来喝茶时永远“举杯齐眉”，以示对彼此的敬爱。

张允和九十三岁去世后，周有光也做好准备。“我比她大四岁，她去世了，我想我自己也快了，所以把家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我的孙女拿走了。想不到活到现在。人家说我年纪大了，活一天少一天，我说完全不对，我是活一天多一天。”

1989年离休之后，周有光大量阅读、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内容。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，他出版了文集《百岁新稿》，今年1月，又出版《朝闻道集》，收录平日思考心得。他自嘲是“两头真”的学者，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，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。

“我一百〇五岁了，明天要死了，讲错了没有关系。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。”他又笑起来。

## 历史是不讲道德的

**灵子：**《朝闻道集》里开篇就提出小康与大同的关系，您认为小康是现实，大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？

**周有光：**假如我们研究古代到现代、西方到东方，会发现所有的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，就有理想出现。文化太低的时候，没有理想，只有迷信。中国了不起的地方是，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就提出大同的理想，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。但是他举出小康的践行者（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等），却举不出大同的实践者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同是理想，小康才是现实。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，指导我们往前面走，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，实际发展中永远达不到的。

什么是小康？小康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，不是一人一个月拿两千块钱，它是永远前进的实际的生活。我们要研究发展具体的生活，要发展经济，同时政治、文化也要跟上。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：经济从农业化、工业化到信息化，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，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。

**灵子：**那您认为中国现阶段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这三个方面各占什么位置？

**周有光：**经济上，中国的农业化高度发展，但是工业化阶段落后于西方。今天我们的工业化有所起步，靠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，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就是接受外包，outsourcing，讲穿了就是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为人家服务。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，可是你不走这条道路起不来，印度也是用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，我们成了“世界工厂”，他们是“世界办公室”。

我们参加世贸组织谈判了十五年，俄罗斯到今天谈判还不成功，它批判中国说参加 WTO 还不是受人家的“剥削”吗？是“剥削”，但是这跟老的“剥削”不一样。以前你什么都没有，所有好处都是我的，现在是你也吃到一点，虽然

我吃得比你吃得少，但是你愿意受我“剥削”。外包就是让双方都有差价可取，实现双赢。

台湾的宋楚瑜来大陆，在北大讲到均富，他讲错了。这是共富，不是均富。均富是一种平均主义，大家要平分，这是永远不可能的。共富是邓小平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先富带动后富。经济学不是道德学，讲道德是另外一回事。历史是不讲道德的。

灵子：可是现在先富并没有带动后富，反而是贫富分化更严重了。

周有光：现在存在两大问题：贫富并不均等，贪污腐败严重。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经济发展了，四大家族把国家资产廉价买来，造成垄断，这是贪污；印度尼西亚，苏哈托发动政变把苏加诺打掉了，经济有所发展，可是发生裙带资本主义，这也是贪污；俄罗斯今天的百万富翁都是原来的头头们……国营翻牌变成私营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这个都是野蛮的原始积累，很难避免的。假如搞得好，可以相对好一点。

现在大家讲中国崛起，我觉得还没有，只是初步的工业化。外包的成分里劳动力含量越多，外包水平越低，我们还在最低的一个层次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改，外包的技术要提高，争取占多一点份额，解决一部分失业问题。今天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因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。这两天报纸都在讲许多工厂招不到工人，因为工资太低，农民都不愿意来。这是一个好现象，这就要提高工资水平，低工资的生产就包到外面去了。

灵子：您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信息化时代吗？

周有光：信息化在中国也已经开始，但是今天碰到大问题了。罗斯福曾提出“四大自由”（注：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、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），现在是“五大自由”，第五个就是网络自由，网络不应该被控制。按照网络和信息化的发展，以后所有国家都不能保密了，因为信息化是一直伸到每个人家里面的。

我们的办法是拦，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你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花

样，很快要被新技术超过。到时候要怎么应对？

灵子：那政治方面的发展呢？

周有光：政治方面，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。有神权国家，有君权国家，有民权国家。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。从政治发展来看，伊朗是一万年以前的国家。所以摆不平，弄得不好要打仗。最近有人说现在的世界不是越来越太平，是越来越危险，但是怎么解决这个危险谁都不知道。因为历史没办法预言。

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没有工人的工厂，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三个工程师，玻璃墙后面都是自动化作业。后来我又在美国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，在夏威夷，一个农场只看到五个人，都是机械运作。这些是马克思不能预料到的。再比如，股票制度也改变了资本主义。美国工厂里的股票一半都是工人买的，工人做了老板，自己又被“剥削”又是“剥削”人的，事情就复杂了。

灵子：按照您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，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？

周有光：我是乐观主义者，事情是慢慢来的，不要着急嘛。我在外国常常有人问我，中国为什么搞得这么慢，我说中国有五千年，你们只有两百年，所以你们着急我们不着急，急也没办法。

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有许多工作要做，首先要制定法律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订了一些很好的法律，比如《物权法》。

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，不可能避免的，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，老了要死，一样的道理。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，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。我们跑在后面，好处是已经有了改革开放。我认为有两个前提，一方面上面要开放，一方面群众思想水平要提高。现在一批批留学生回来，会有影响。有人说如果中国都是留学生了，那个时候就好办了。但我说没有那么简单，从美国回来照样有私心，有了权照样会贪污。

## “双文化”是今天的主流

灵子：文化方面呢，中国是否从玄学进入了科学阶段？

周有光：神学的特点是依靠“天命”，玄学重视“推理”，科学重视“实证”。举个例子，神学阶段说太阳不会动；后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，得出结论太阳围绕地球转动，这是玄学，没有实证，但在当时是大大的进步；科学阶段就真正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。

文化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大。中国是了不起的文明古国，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。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落后，但借助文艺复兴起来，在科学、民主这两件大事情上跑到了前面。我们学科学，只引进了自然科学，社会科学除经济学之外没有开放，许多学科非常落后。

比如经济学，中国以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。马克思主义否定资本家，说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，自己没有创造价值。可现在也承认资本家有三种功能：创业、管理和发明创造。创业最难，美国工业发达，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。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，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，发展成为许多门学科。

社会学，这是阶级性最强的，我们不学。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阶级，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，并非只能你死我活。但我们曾经否认社会学的存在，前苏联长期不知道有这门学问，我们更是在“文革”之后才重建这个学科，比前苏联晚二十多年。

政治学，现在变成许多门管理学。按照新的政治学理论，全世界的官只要百分之一就够了，电脑可以代替许多官。据说中国有数千万的官，实在太多了。

教育学，我们的教育糟得不得了。现在中国教育有两个大问题。第一，大学缺乏学术自由，都是做官的人管理，荒谬到大学里搞行政工作的处长相当于教授。第二，存在大量的无效劳动。中小學生每天搞得很晚，累得要命，但时间都浪费了。比如来一个大人物，学生就要出去列队欢迎，这怎么可以？

灵子：您认为我们现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得还远远不够？

周有光：文化一定是多种文化的混合。单元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不能继续发展了，要有外面的文化来嫁接。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时期就了不起了，但是后来开始衰落。汉代有印度佛教传进来，经过了几百年演变，到唐代与儒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混合起来，这是华夏文化的第二个时期。许多好东西都是印度文化带过来的，比如中医、雕塑、建筑、歌舞，等等。到了清朝又有西洋文化的嫁接，这是第三个时期。我们今天是学习西洋文化，因为它的文化比我们高，不单是因为他们生活水平高。

改革开放之后有人提出“三十年河西，三十年河东”，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，许多人很高兴。我不参加这些讨论。八十五岁以后人家要我写点文化的东西，我就提出“双文化”论。

首先文化不是东方、西方这么分的，谈文化要拿历史作根据。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，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：东亚文化、南亚文化、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。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西方文化。这四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期相互流通，大致从十八世纪开始，不知不觉发展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，由世界各国“共创、共有、共享”。比如说电灯，今天不能说美国文化了，是世界文化。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，发展民主较早，开创科技较快，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，被称为“西化”。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，不能低估。

另外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，而是高处流向低处，落后追赶先进。“河西河东”论是由“自卑综错”变为“自尊综错”，没有任何事实根据，只是“夜行高呼”的懦夫壮胆。

现在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的“双文化”时代，这是今天文化的主流。

## 汉字可能还要简化

灵子：您如何看待今天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，以及百家讲坛讲国学引发的热潮？

周有光：首先“国学”两个字是不通的。世界上没有一个“国学”，学问都是世界性的，是不分国家的。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。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复兴华夏文化，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，而是文化更新。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，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。具体怎么做呢，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：提高水平，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；适应现代，不作玄虚空谈，重视实用创造；扩大传播，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。

许多人批评于丹，说她讲得不好，但我认为于丹做了好事情。她为什么轰动？是群众需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，需要知道我们文化的传统。他们有自动的要求，文化寻根与小儿女寻找亲生母亲一样自然，失去“母亲文化”很久了，自发的理性追求当然特别强烈。于丹碰上这个时期，一下子成了红人。她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，让文化饥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。

灵子：现在有学者借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，呼吁恢复繁体字，您怎么看？

周有光：恢复不了的。他们问我这个，我说你去问小学教师，最好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，小学教师赞成什么就是什么。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。五十年代要进行文字改革，因为当时中国的文盲是百分之八十五。怎么现代化呢？要广大群众来学，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，必须要统一标准。另外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，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，越来越简化，从历史来看、从理论来看都是这样。

我倒认为现在简化得还不够，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。我有一次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，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，哪一种用得最多？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，但是不宣传，因为有些人会不高兴。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百